



东大街溯源

□ 陈友兴

东大街是高邮的历史文化名街,其历史可追溯至两宋时期。

北宋开宝四年(971),知军高凝祐始筑高邮城,城略呈方形,明清《高邮州志》称其为旧城。其后,高邮城进一步向南北方向扩展,大部分居民沿运堤而居,商店、集市相对集中于傍河的南、北门一带。在城北运盐河(臭河边)的北岸,即今东大街沿线地域,也很早就形成了市井繁华的街区。

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载,建炎三年(1129)二月,癸酉(二十四日),韩世忠提辖使臣李在,“诈称五台山信王下忠义军”,“聚集溃卒数千,遂据高邮。”李在义军在高邮,“乃遣人截金后军,得金宝船数艘,故其军甚富”,成为高邮城重要的抗金力量。三月庚寅(十二日),“(赵)士从闻高邮贼李在往楚州,遣统领官不侧乘虚掩袭,至岳庙下,遇红巾百十,皆杀之。取其衣伪称在党,行至草市,行武不整,讙噪杀人。在觉之,出兵迎敌,不侧仅以身免。”赵士从,赵宋宗室,主管高邮军宗子。金兵来袭时,率众避屯兴化县。

《舆地纪胜》卷四三,高邮军,“东岳庙,在城东三里五十步。太平兴国(976—984)中建,为屋几千楹,为东淮祠庙之冠。”

元末陈基《高邮》诗云:“秦邮水为国,层城高郁郁。三面阻重湖,深湟中荡滴。”高邮城三面阻水,唯北门外地势开阔。自兴化到高邮城,只有沿运盐河北岸大道向西,再到高邮北城门。在民国三续《高邮州志》卷首城厢地图上,大道从泰山庙向西,经东大街,至北门大街折向南,即是高邮北门。这条路线,几乎是两地陆路往来的唯一通道。

赵士从军在岳庙杀李在义军上百人,从容换装,直至在草市“讙噪杀人”,李在方才“觉之”。则这个草市,当在岳庙西侧的城区地带。隆庆《高邮州志》卷一:集市,“蛤蜊坝,蒲草市。东河、下河,俱草市。”隆庆志卷二:“蛤蜊坝,即旧下阡,在州东北。”“太平桥,古名蛤蜊坝,在北门外。永乐二十二年(1424),乡民戴伯祯等造。”蛤蜊坝,在东大街中段,为古运盐河上的控制性水利设施。其具体位置,在今傅珠路与珠湖路的交汇处。直到明代,这里仍是柴草的集散地之一。因为东大街是不侧一行的必经之地,故其“讙噪杀人”的草市,必在城北大街沿线。而最大的可能是东大街的东段,即以大淖河为中心的地区。至今,这里尚存有草巷口、窑巷口等与之相关联的地名。

韭香四季

□ 张玉明

在乡下时,曾得到一小块菜地。妻拿不定主张,不知该种什么好,便来征求我意见。我不假思索,种韭菜啊。妻问,为啥?我振振有词,蔬菜里唯有韭菜是多年生的,种一回,可反复收割,无需再种第二回,省时省事,一劳永逸。“一种而久者,故谓之韭。”古书上就是这样说的。

凭借“割了又长”这一优势,韭菜在众多蔬菜中脱颖而出,成为农家菜园的首选和必选。记得奶奶的菜园里种过韭菜,母亲的菜园里也种过,现在妻子的菜园也种上了。外出散步,看到周边的农家菜地里都种有韭菜。菜市场的货架上或路边小摊贩拎的菜篮子里,几乎都码放着择得整整齐齐,碧如翡翠的韭菜。

韭菜种植的历史很悠久。两千五百年前的《诗经》中就有“献羊祭韭”的诗句。不过那时的韭菜跟现在还不一样,一年只能割两回。因为喜爱,人们对它另眼相待,用心栽种,到了一千五百年前的北魏时,贾思勰在《齐民要术》中说,“一岁之中,不过五剪。”一年能剪五次,已经很

东大街为一条东西向主街,其两侧呈羽状分列众多大巷小巷。这些古巷,都有着各自的故事与传奇。其东首滑石巷,据说是当年韩世忠由盐河(臭河边)上岸登临之处。这些包含浓厚古老文化气息的古巷,也佐证了东大街历史要远早于两宋之交。

隆庆志卷一二:“东岳行宫。在州治北新城小东门外街北。”小东门在东大街东首,门外为外街,门内对应的东大街则是里街。应武《岳庙记》:泰山庙“东以东墙外路为界,西以西墙外路为界。南以三门滴水至官街为界,北至竹林寺后莲花池北岸民田为界”。东门外街,宋代即已有之,其时为“官街”。东大街在新城小东门内,论其历史,固应大大早于外街。

方志记载,淮东制置使毕侯于高邮城北筑新城。但新城的筑就,远非一日之功。宋余壹《瞻衮堂记》,绍兴五年(1135)秋九月,韩世忠移师楚州,“命其属提举董侯攸攸修筑高沙,筑城聚粮,以为老弱休养便地。”韩世忠军主力在楚州与金人对峙,将其身后的高邮打造成为重要的战略后方。其时,在高邮城北已经形成成熟的街区,这是其“筑城聚粮”的必要条件。经过董攸及其后来者持续不断的苦心经营,为后来的构筑新城打下了雄厚的实力、物力与城建的基础。开禧三年(1207),毕再遇筑造新城,开重濠,乃收大成之功。东大街也由此纳入新城之中,成为新城街区中东西向的一条主街。

隆庆志卷一:街坊,“北门外街:分巷十六。(街东)东台巷:分巷七;庙巷街:分巷七。”隆庆志:牌坊,“双凤,为王珏立。登第,为朱嚄立。双豸,为朱礼、朱嚄立。世美,为孙瀚立。柱史,为张胆立。司马都宪,为陈玉立。内翰,为孙绳立。步蟾,为冯信立。经济,为陆钧立。攀龙,为韦经立。以上俱在孝义厢退观街。”隆庆志卷一:厢里,“孝义厢,一里,在州治新城多宝街。”隆庆志卷二:桥,“税务桥,古名退观桥,在石桥北,课税局前。宋嘉定年(1208—1224)造。”退观桥(税务桥)北就是东大街,退观街名必与其相关。

阅隆庆志,退观街拥有10座牌坊,是高邮城所有厢街中之最多的,不仅反映了其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,也表明了退观街宏大的规制。纵观整个城北地区,南北主干道为北门大街,东西则是东大街。从税务桥巷头,至文游路街长达一公里。故从规模与街名来看,退观街就是东大街。沿北门大街东侧,南为东台巷,北有庙巷街,两街巷之间只有东大街,舍此则退观街便

无从落实。至于是退观街因名于退观桥,还是退观桥因名于退观街,笔者倾向于后者。毕竟东大街的形成至少是北宋中后期,而退观桥是在新城筑成之后的嘉定年间才建造的。换句话说,是先有退观街的街名,而后引申出退观桥的桥名。

雍正志、嘉庆志照录了隆庆志,坊牌目下备注:“今废坏者过半,姑仍旧志表之。”其中,“柱史,为张胆立。石坊现存。”说明迟至清代乾嘉时期,东大街仍名退观街。

雍正《高邮州志》卷六:“水陆庵。在州治东街炼阳庵后。”“炼阳庵。在州治北新城退观桥东北。元大德六年(1302),道士盛心渊建。”炼阳庵,也称炼阳观,位于东大街中段北侧。建国前还在,有著名的茶馆洞天楼。很明显,这里的东街就是东大街,似是民间的俗称。

民国三续《高邮州志》卷首,城厢图说,“北城外西街较他处稍高。就中隆起者为社稷坛……由此迤东迤北,逐渐低落。以东街、北街尾段与坛地相较,大率相差至八九尺。”社稷坛位于北大街中段,税务桥西,复兴街以北。旧有高台,南北长约120米,东西宽约80米,高出地面约3—4米。宋代驿站迎华驿,元代秦淮驿,都坐落在这里。明代台上建有社稷坛,后来又有天地坛。文中东街就是东大街,北街就是北大街。“原志载城内外市廛极多,今可称者约共五处。城内中市及南北门外两市均盛;次则北街庙巷口,东街草巷口贸易尚多。”“东街草巷口”中的东街所指极为明确,就是东大街。在清代前期至民国时期,东街是东大街的官方与半官方的称呼。

乾隆《高邮州志》卷一:“北大街:东分东台巷街,新巷口街;西分多宝楼街,又西至太平街。”与之平行的,则是“沿河通湖桥街”。

民国三续《高邮州志》卷首:“城内南北街最殷盛,州前街次之,东西两门最为闲冷。”“南门外街市殷盛,而地面偏狭,建筑颇难推扩。北门外地面十倍于南,但只北大街及新巷口街民居栉比。余街巷虽多,大率有菜圃或坟荒相间,不甚联属。”在民国城厢图上,高邮城北南北轴心为北大街,东西轴心为东大街。其生长的深层动力,一曰大运河,一曰运盐河。故在城北,能与北大街相称的只有东大街。“北大街及新巷口街民居栉比”,这里新巷口街应当就是东大街。在城北,有著名的新巷口小学,始建于1911年,初名为启愚简易初等小学堂。1921年改称鬼神坛小学,1937年改名为新巷口小学。三续州志卷首地图,新巷口小学处有土地庙,其西侧为梁家巷。新巷口小学,实是因东大街之另称新巷口街而来。

民国十一年(1922)高邮县城厢图,相应路段径标为东大街。这是东大街的街名首次以官方的名义出现。

钱买肉或豆腐干与之搭配,只是单炒韭菜,我们也是吃得津津有味。有客人来时,会加上一两只鸡蛋一起炒,碧绿金黄,入口润滑,风味绝妙。

夏季的韭菜口味差些,仍比其它蔬菜有味。韭菜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辛辣味,刺激味蕾,健脾开胃,增进食欲。祖母在世时说,吃鱼费饭,吃韭菜也费饭。意思是吃鱼,吃韭菜要多吃饭。那时计划经济,粮食紧张,每顿都得精打细算,否则寅吃卯粮,吃透支了,到月底就会无米下锅。

秋天,温度下降,韭菜又回到慢节奏生长,尤其深秋里最后一次收割的韭菜,世称末刀韭,味道一点也不逊于春韭。江湖上流行一种说法,韭菜要吃头和尾。头就是春韭,尾就是这末刀韭。韭菜真是一种善始善终的菜蔬,有一个无以伦比的开头,还有一个回味无穷的结尾,可谓功德圆满。

冬天的韭菜完全停止生长。祖母用草木灰覆盖在菜畦上,既提供营养,又可保温,防止韭根冻伤。整个冬季都不能吃到韭菜。如今不一样了,交通运输便捷,加上推行大棚种植,季节的界限渐渐模糊。寒冬腊月,菜市场依然人头攒动,摊位上依旧琳琅满目。既有南方的韭菜,又有本地的大棚韭菜,还有由韭菜演变而来的韭黄。虽然有违“不时不食”的古训,却可一解馋瘾、一慰乡愁。

一张旧照忆当年

□ 徐松

我家相框里有张泛黄的照片,上有一行小字依稀可辨:“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三十周年”。这是当年镇上文艺宣传队的合影。

前排中间坐着的,是演李奶奶的,她背台词、练京腔、学动作,一点不输年轻人。“痛说革命家史”,唱、念、做,一刻不停。“血债要用血来偿”唱下来,有点气喘吁吁的。有人说:“您赶快喝点糖茶吧!”“不用,歇会儿就好了!”谁知,锣鼓家伙一响,她又来神了……

身旁的姑娘,长辫子,大眼睛,一看就知道演什么的了吧。“都有一颗红亮的心”等唱段,让她光彩照人。直到家里有了第三代,人家还叫她小铁梅呢。

手提红灯、气宇轩昂的,自然是李玉和了。每当唱到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“临行喝妈一碗酒”时,观众都跟着他唱,台下几乎一条声。记得第一次看“刑场斗争”时,伴随着一声声口号,突然响起一阵枪声。我们这群孩子很难过,以为他们真的牺牲了。直到有次去后台玩,才解开了谜团——原来,那枪声是用模拟炮模拟的。

谜团,还不止一个。扮演鸠山的,胖墩墩的,头发浓密。可是,一上台竟然成了光头,而且每次化妆时,他总要带个小饭痞子,还不许别人碰。我们猜想,那里面肯定有什么宝贝。消息灵通人士看出我们的心思,慢慢地说出了秘密:原来那里面放着套头用的猪尿泡,那东西怕风吹日晒,也怕热怕冻。唉,怪不得当做心肝宝贝!

鸠山旁边,站着刁德一。白白净净,文质彬彬。“适才听得司令讲,阿庆嫂真是不寻常……”,不紧不慢,阴阳怪气的,戏迷们听了连声叫好……

坐在李奶奶另一侧的,皮肤白皙,笑起来有两个酒窝,一上场,就吸引了全场的目光。“垒起七星灶,铜壶煮三江……”人一走,茶就凉”,嗓音洪亮,扮相优美。她是我父亲的表妹。

说到我父亲,他长得胖,嗓门大,是天生的胡司令。表兄妹同台演“智斗”,一个青衣,一个大面;一个地下党员,一个反面人物。家庭聚会时,亲友们常开玩笑:“胡司令,快去给恩人敬杯酒吧,人家可救过你的命哦!”我姑妈笑着说:“不不不,我来敬司令,他洪福广,所以方能遇难又呈祥。”即兴表演,常常引得大家开怀大笑。

最有趣的是,每年六月“晒伏”时,父亲总要把那套军装行头连同盒子枪道具拿出来晒晒,生怕受潮发霉。受好奇心驱使,我总想看看那把枪到底长的什么样。有一回,雷暴雨突然要来了,抢救东西时才发现,装在皮套子里的竟然是木头做的枪,外面涂了层黑漆……可惜,搬了几次家,那些东西散失了。

那时的文艺宣传队,大多是业余群众组织。大家白天忙生计,有不少还是手工业劳动者,晚上才能抽出时间排练或演出。

由于住得分散,若临时遇到有什么事,只能挨家挨户上门通知。这个光荣艰巨的任务,往往会落到演伍长的黄大爷身上。照片中的他,五十岁左右,体壮如牛。他是做秤的手艺人,做事很认真,待人又真诚。接到跑腿之类的任务,他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,抓个烧饼边走边啃。人还没进门,大嗓门就喊起来了:“老徐,在家吗?哦,不在呀。哎,小徐,和你爸爸说一声,晚上继续排练呢。就说我来过了哦!”说着,就匆匆忙忙地往下一家去了。

坐在他边上的,是镇文化站站长。此人是外地的,来界首多年了,口音却一直没变。在他的努力下,镇上文化工作风生水起。不仅有文娱宣传队、放映队、故事队员,还有图书室、象棋室、书场(临时),拥有一批影评员、乡土作家。小镇上,还出了位农民诗人,曾去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,轰动一时。他自己平易近人,甘当配角,在《红灯记》中客串卖木梳的。紧挨着的,是演狱警的,戴一副大眼镜,个子不高,嗓门却特别大。即使不用扩音器,一声“带——李——玉——和——”,也能震撼全场。

后面站着的是乐队一班人,吹拉弹唱,各显神通。浓眉大眼的那位,笛子吹得好好听了;有时候,还扛个板凳喊几声“磨剪子来,铲菜刀——”。琴师们,不仅京胡、板胡拉得好,而且还会弹奏月琴、琵琶;其中有个易老师,还是知名的作曲家,许多民歌就是他谱的曲。几个“武场”(敲锣打鼓的)聚在一起,个子高的那位笑眯眯的,左手拿响板,右手持鼓键,显然是乐队的领军人物,最显眼的要数他头上那顶雷锋帽了。

看上去就有艺术家气质的那位姓卞,是负责布景道具的。那时候,为了节约经费,道具基本上是就地取材,布景也是一景多用,卞叔叔也就身兼数职了。后来,他还说过书(是我学说书的师傅)、办过企业,干一行精一行,成了行家里手……

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。五十多年过去了,照片中的人多已作古;即使健在的,也都步入老年。